

现代作家创作丛书

路翎小说选



作家创作丛书

路翎小说选

书 馆

表

期限归还图书

25562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186号

路翎小说选

编者：朱珩青

责任编辑：朱珩青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77千

印张：12.875

插页：6

版次：1992年9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532-1/I·531

印数：0001—·2,600 册

定价：7.25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版说明

《现代作家创作丛书》是作家出版社为“五·四”以来在中国文坛上卓有建树，现仍笔耕不辍的老作家而设。丛书在体裁、内容、写作年代上不拘一格，由作家自选其创作历程中有特殊意义的作品，尤其着重于新作。

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某些以“通俗”为名，实则内容粗劣的软性作品充斥图书市场，严肃文学的处境十分严峻，步履维艰。出版这套书，足见我们期待严肃文学兴盛发展的拳拳之心。

谨以此丛书表达我们对老作家创作活动的支持与敬重。

作者小传

我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生于南京。

在四川为流亡中学学生时，曾在合川民办的《大声日报》编文艺副刊“哨兵”。也给《时事新报》副刊等投稿散文，用的笔名是流烽、烽嵩。

一九三九年，写小说《“要塞”退出以后》投稿胡风编的《七月》。在煤矿区矿冶机关为小职员，写了后来收到《青春的祝福》里的煤矿题材小说和中篇《饥饿的郭素娥》。

抗战期间在几处为小职员，写了《蜗牛在荆棘上》中篇，及《财主的儿女们》长篇以及《求爱》，《在铁链中》短、中篇。一九四四年和余明英结婚。

抗战后在南京，写剧本《云雀》，短篇小说集《平原》，长篇《燃烧的荒地》。

解放后，在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写《朱桂花的故事》小说集。后到北京青年剧院，写《人民万岁》《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剧本。一九五二、五三年到朝鲜战地，回来写《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小说，写了长篇《战争，为了和平》。

一九五五年起，胡风集团案被囚二十年。八〇年平反，回到剧协原机构。



作者近照

柳顺昌，满脸都是靠庆心。
绝然的神色，跟在他底女人后
面，他们死平原里划走着。小
路上积着很厚的一层灰，连路旁
的荒草都被灰尘遮蔽了，阳光
照进得到眼，无边无际的平原
上呈着罕为大地一般以黑热：
各处都反射着强烈的光，一切
都显得肃穆、有力、鲜明，在
深沉的寂静中竟已显不出它的
底热来得差不多就要昏迷的生
命来。平原底远处有一排红
色的西瓦建筑，在阳光中特别

作者手迹

序

朱 珩 青

—

这小说是别一种的声音。

这声音的背后存在着一部历史，存在着赖以发声的一整套对外界刺激的接受系统、反馈系统，存在着别样的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和叙述方式，其表现形式为：绝不循规蹈矩。我以为这是路翎和他的创作的根本特色。

在人们为民族存亡呐喊的时候，自然有路翎的声音。所不同的是他并不仅仅是一般的呼救，而是直接切入民族救亡者的灵魂，要剥除那使人骨头不硬的奴性，要展露出人们心灵的创伤，要刺激和修复战斗者的自尊、自信。在路翎这里，没有《放下你的鞭子》的由哀怨而生的奋起，也找不到《差半车麦秸》显见的民族新生的趋向，有的只是不停息地追求。像鲁迅先生的“过客”，存着一线希望，踏着荆棘赶路，负着挫折和孤独。当然，路翎也曾极度亢奋过，但很快他就发现，跟在热情后面的

是漫长无尽的路。于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由鲁迅先生开创的疗救、改造国民性的巨大工程之中，而且路翎在这里找到了自己。

路翎的小说的人物大多生活在最底层，属于社会的“贱民”。破产农民、穷苦工人，泥瓦匠、挑水伕，店伙计、说书人，算命先生、孤寡老人，小公务员、流氓地痞，贫穷的学生和教员，都是他关注的对象，都是他小说的主人公。

这些人负荷着最沉重的历史重负，社会、人生对他们最残酷，然而他们都是一批如鲁迅所说，能够踏着“酷”前进的人们。路翎认为这些人的生活虽然是最平庸的，也许不无丑陋，然而正是这些“呻吟在黑暗的重轭之下”的“人生斗争”，才是“我们时代的诗”（1946年7月20日《求爱》集“后记”）！路翎以最大的热情去拥抱这生活，拥抱这些人们，挖掘出平庸生活下面最光彩的人性，绘制出最灿烂的诗篇。

在这里，“通常”的尺度对路翎来说没有什么用处。

二

路翎笔下的“贱民”大多经历过非人化的灾难，他们没有正常社会人们的幸运，他们不是生活在地上，而是在地狱。他们被黑暗腐蚀，又在与黑暗的抗争中被磨损，所以我们在路翎那里看到的人物，没有几个是完完全全的。他们在物质、精神的双重折磨下，不是遍体鳞伤就是精神失常（或近乎失常）。他们中的好大一部分是被地狱吞噬了的，到现在路翎还在“怀念”的《黑色子孙之一》的金承德就是被黑暗吃掉的一个。能够从地狱中爬出来、站起来，就是伟大的勇士。当然，他们的伟大不在于他们完成了什么宏业，而在于他们的遍体鳞伤的挺立，在于

他们撕碎黑暗的同时，也敢于撕碎自己的勇气和重铸自己的决心。他们不仅要改变现存的生活处境，更要改变自己的精神状态。他们是挺立的新人，是伟大的精神战士。我们在《在铁链中》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幅宏伟的图画。

69岁的何德祥，一辈子在苦海中挣扎，在与压迫者和与自身的弱点的抗争中，闹得家不像家，人不像人。因为又得罪了地方一霸的刘四被锁在铁链中，和许多生着烂疮的囚徒一起，被派做苦役。他赤着脚，棉裤的花翻露着，像是半空中的一个小孤魂，他双腿抖索着，站在脚手架上。下面是穿着缎子皮袍、团花马褂、慈祥而威严的刘四，以及他的小城的崇拜者们。他们正陪着镇长视察工地。太阳暖暖地照着这些幸福的人们。半空中突然传来两声冷笑……面对着自己老婆匍匐在地求饶的身影和新的迫害，何德祥震怒了。他用砖头砸向自己老婆，高喊着“我何德祥是连颈子都不会弯一下的”！并历数刘四的罪孽。这喊声震慑了整个工地，带来一片长久的肃静和惊慌……看来，精神战士确如胡风先生所说，是在“一下鞭子，一个抽搦，一个步子，一印血痕”的磨砺中铸就的。

三

因为路翎看重人物精神的新生，因此他对人物的试炼就显得特别严酷。他似乎全然不理睬他的同行们直接推动抗战的创作趋势。如揭露政治黑暗的《腐蚀》，鞭挞抗战官僚的《华威先生》，汲取历史教训的《天国春秋》，宣传爱国主义的《屈原》，只是一头扎在自己的人物试炼之中。从这点看，路翎是固执的，当然也是独特的。

不要说那些有知有识的文人，他要将他们的灵魂搅得天翻

地覆，如《人权》里的明和华，路翎是非要把他从虚无中拖出，让其历劫从勇敢到怯懦，怯懦到勇敢，撕掉知识的伪装，走向坦白的人生不可，就是无知无识，被一般人目为只懂得一碗饭的意义的“简单”的农民，他也要折腾他们，而且让读者看到这种灵魂拷问的并不简单。

以《平原》为例。《平原》仅仅写了一对农民夫妻的吵架，但却波澜起伏，险象丛生。两个人又吵又打，又追又赶，又发疯又跳河，折腾得死去活来。作者将他们的灵魂挑了出来，又搓又揉，直揉得绝望过去，又苏醒回来。这样的折腾到底为了什么？如有人说的得到病态的快感？不，不是的。让我们望一眼读者阅读体验的屏幕就豁然开朗了。上面呈现的已不是人生舞台上揪打的残酷，而是舞台后面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残忍。是它制造了这场夫妻的决斗，是它驱使他们自己动手一点点榨干自己的每一分生命的活力，是它又将压榨的石磨悬在他们的头上，而让他们得到暂时的和解的愉快。这场由征米引发的吵架，又以县城来了一营兵还将征米宣告结束。显然这只是又一轮压榨的开始。

我想，这种以人物自身的搏斗所反映出的社会面貌，其深度、力度和强度一定不会比直接的、具体的、以至血淋淋的描写更差的吧。以此观之，无论是正面描写抗战的，还是侧面表现抗战大趋势的作品，原来是异曲同工，一路前行的呢。

四

我们知道，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大多可以通过不同渠道的泄漏，以维持人生不可或缺的心理平衡的。有权势的，自然可以通过权势实现自己，有钱的可以通过挥霍满足自己。读过书

的，有某种技艺的，健康的体魄，高尚的娱乐，都可以某种方式维持心理上的，哪怕是最低点的平衡的，然而对在最底层的人们来说，所有证明自己价值的渠道大多关闭着，他们的压抑常常处于满负荷状态。要不，怎么会有契诃夫笔下的马车夫和马说话、交流感受的故事出现的呢。

我想，这正是路翎小说获得充沛的灵魂搏斗的能量的原因，而且路翎的奇巧还在于他总能将他的人物的内心推向压抑的最高点，然后找出一个最佳突破口，让其喷发。因为有一压再压、欲喷不能的蓄积，所以那喷发有着不可遏止的迅急。如山崩，如海啸，如惊雷，如火山爆发：雄伟壮观，光彩四溢。

下面请看一个最简单的人生的喷发。

《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猪》里的王家老太婆今年60岁，社会和亲人全都抛弃了她，她的内心积满了对社会、对人生、对儿女的仇恨、不平、怨尤……但对这个社会的唯一希望支撑着她活了下来：她希望死后得到一套尸衣和几张纸钱。于是风雨飘摇中像游丝般的生命又重新焕发了。她哭喊着以二分利借钱买了一头小猪。显然这小猪就是她的性命。但这个畜生不通人理，偏偏在当天那个喧嚣的风雨之夜跑了出去。在希望和希望可能破灭的两个端点的灵魂震荡中，王家老太婆追赶小猪的过程就成了她生命最光辉的段落，感情最丰富、内心斗争最激烈的展现的突破口。

别看这个无知无识的“愚蠢”的老女人，她却有着绝大的爱心和忍耐力：小猪没穿衣服，这冷风冷雨如何受得了？就是冷了、饿了也说不出，可怜的畜生！她手里虽然拿着一把箠条，却全是拍打在地上和篱笆上的。她柔声细语地哄劝着她的小猪，有时嘴里也吓唬着，可心里却十分地爱着的，像爱自己的

儿女一样……但几乎用尽气力也无济于事时，她变得凶狠起来，将自己对社会、对儿女的一腔仇恨全都倾泻在小猪身上，她毒打着小猪，数落着它的顽劣……然而她还是后悔了，爱心又回到她的身上，但对未来事变的恐惧使她走向了生命的尽头。她与小猪一起躺在泥水里，幻化着外孙女来接她的影像离开了人世。

在这个小小的人生故事里，灵魂搏斗的功能显见是多方面的，其内涵相当丰富。在这个意义上说，路翎可以称得起人类灵魂的大师，很像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路翎非常喜欢他的《穷人》、《罪与罚》，对他的《卡拉玛佐夫兄弟》颇有微词，然而陀氏对路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五

已经涉及到心灵能量的来源问题了。在这方面路翎是比较地推崇原始的强力的。关于原始强力的具体内容路翎没有非常明确地说过，但从作品可以看出，他倾向于原始力中的生命本体向上的不可遏止的冲动，而对其破坏力方面不予取用，大概是与死亡本能相对立的生存本能的东西。这可以从胡风先生给路翎的讨论作品的信中得到证实。胡风说：“不能提倡个人主义，不能只记得被压抑的个人。放任的个人的凶残和卑污别忘了（1944年11月4日）。”胡风是不主张放出原始强力中那头卑污、凶残、弱肉强食的野兽的。从路翎的创作实践看，《饥饿的郭素娥》里的原始强力倾向于人的强烈的性欲和争取新的生活的愿望，《泥土》里是争取自己劳动所得的朦胧的主人地位，《杀猪》里所强调的是保护自己不受污辱的生命的权利。

这种来自生命本体的潜在力量在路翎的引导下显示出了它

的野性的强大，它“扰动了一个世界”（胡风语），当然，代价是生命本体的毁灭。显然如此，还是要比奴性十足地任人宰割好得多。

路翎笔下的原始强力与产生它的生命本体一样，它是活生生的，有着自己的律动、自己的节奏、自己的表现形式的。它与人的社会生活相生相克，与大自然的力互相感应，互相推动。请看《蠢猪》。

年轻船夫王树清战战兢兢地为专员撑船。无奈山洪暴发行船艰难，专员以上等人的方式不断地斥骂船夫：“鸦片鬼”、“蠢猪”、“送你上镇公所”、“枪毙你”。船下滑时，专员大人还打了船夫两记耳光。王树清先是忍耐，继而是委屈，再后是申辩，最后是反抗。那生命的原始强力潜在地、盲目地支持着这位卑微胆小的船夫；洪水的喧嚣、巨浪的翻覆，船夫在撑船中与自然搏斗的力量的展现，也激励着船夫的心，使他感应到生命的存在和自尊，于是一步步由屈辱走向反抗（当然也走向危险）。戏的结尾是专员被送上一个荒凉的河滩，船夫隐入一丛竹子的背后。这就是经过路翎过滤后的带着某种合理因素的不可抑制、不计后果的原始强力的表现。

在颂扬原始强力的同时，路翎没有忘记作为精神战士的责任，对其中消极的部分进行着不遗余力的批判。如对《草鞋》里“三叔”给予张么妹天真美好希望的本能的践踏，《预言》里算命先生由嫉妒而生的报复。这些本来可能游离于社会层面的人性弱点，因为作者将它具体地紧贴在时代大的情势上而获得了社会批判的功能。自然，路翎笔下也还有一些比较朦胧、神秘的原始力的颂歌，这应该说是很自然的。在我们尚不能对这些作出合适的判断之前，要求一切都规范化、标准化，显然是很不

明智的。即使我们认定它是缺陷，但任何风格、流派，都是如此。它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从发源地一路呼啸前进，推向它的顶端，带着它美好的生命力的辉煌，同时也带着自身的弱点，它们是共生的，无法分离，也无法提纯。就像这人生，重新安排一次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该苛求路翎什么。

六

人，自从它拥有了文明以后，它对外界的刺激的直接反应就渐渐被文化符号系统这一中介层所隔离。它的接受系统、反馈系统的功能无不因受文化的制约而发生种种偏离。文明发展了人，文明也禁锢了人。疯子的出现，就是文明的功绩之一。应运而生也就有了疯子的文学。文学大师笔下的疯子，有的干脆就是病态社会的最清醒的战斗者，那些被迫害狂们也各各成了病态社会的原告。

路翎笔下的疯子（半疯子）有两类：一类是牺牲品，一类是还在苦苦挣扎、苦苦追求的精神战士。为此路翎曾不被理解，奇怪他为什么要写疯子，要写他们的歇斯底里的发泄和神经质的痉挛。其实，病态社会出现病态现象是正常的事。如果处于“正常人”的优越感上的反思实现的话，人们就会觉悟到：所谓正常社会、正常人的数量、正常人的理性程度是值得怀疑的。要不，这世界怎么这么不太平呢。

在这个集子里，有一篇路翎的早期作品《谷》。男主人公林伟奇，就是个神经质的人，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追求光明战士的品格。他的出身环境，生活境遇，教育状况，身体素质，性情气度的特别，已经使他生就了一副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加之社会环境压力的接踵而来，于是他神经所触及到的每一个层面

都紧张起来，都牵动着他的全付心力，他也就更敏感，更狂躁，精神活动也更紧张。林伟奇过着一种抢夺式的生活，浮沉于水深火热之中。随着他与生活的撞击，我们看到一条非常壮观的人生彩练。路翎对人物试炼的残酷，这篇算是较为典型的了。不过还不如他的长篇巨著《财主的儿女们》。那是一个伟大的精神战士的浸礼颂。他的蒋纯祖很像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七

从以上几方面论述看，完全可以认定路翎是站在现实主义的大旗下的。但他的现实主义又在一般的重人物，重历史、社会、人生经验，重事实的基础上有所变化。他不很看重对人物的表象的模仿，更看重心灵的流变；不很遵循概率的综合和类型化，而更执著于情绪的总体设计和气氛的渲染。

作为一种文学运动，现实主义始终在变化不居的过程中。有的因更崇尚科学精神，而向着自然主义方向发展，有的因更重视直觉、奇想而向着现代主义方向发展。路翎显然是后者。也还有另一种情形，就是现实主义的僵化。它以忽视对人的尊重、忽视对现实的逼真透视而形成的批判品格，以看重功利主义的歌颂而导致现实主义的萎缩、窒息。左倾的文艺路线以及“文革”的“三突出”就是这种东西。路翎曾因此而受到大的挫折被迫中断了创作。但不管是批判的武器，还是武器的批判，路翎的创作风格和功绩是永存的。

其实，因为“现实”总是栖息于人，栖息于人的思想感情之中，所以无不带上个人的色彩，或浓，或淡，或直接或间接，路翎是更强烈就是了。

除了以上的特点外，路翎的现实主义到了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逐渐转向了对现实的讽刺和批判。这点，他与好多作家如沙汀、陈白尘、马凡陀等倒似乎是统统卷入了现代文学的讽刺大潮，有收在《平原》、《求爱》集里的一系列短篇可以证明。《一个商人怎样喂饱了一群官吏》极好地嘲讽了吃人者和被吃者的丑态。《天堂地狱之间》几乎就是一篇新的《孔乙己》，主人公小公务员游荡于天堂（富人）地狱（穷人）之间。而《爱民大会》则通过揭示统治者行为的深刻矛盾而鞭挞社会的虚伪和腐朽。其社会批判的尖锐性在此之前及此之后都是路翎创作中少有的。如果单单从时代赋予的使命和可能性上来认定这种现象，就不免有简单之嫌。我们可以从他一贯的对人性的批判来理解他对社会的批判，批判性是他创作鲜明的个性之一。而且因为这种辛辣的批判，带有他固有的挖掘人类灵魂的伤痕、善于选取特异的类型、从具象的讽刺指向更广泛的内涵，而仍然闪烁出别人无法替代的独特光彩。路翎的讽刺源于《儒林外史》的传统，有俄罗斯讽刺的沉重思想笔触，有别于比较轻灵的偏于语言机智的钱钟书，根本上是沿着鲁迅的讽刺之路前行的。

八

解放前夕，路翎已清醒地看到他的“一些原来用作对旧社会斗争的武器的东西，会慢慢地失去它们的作为武器的性能”的，他说，“对于过去，我无所谓留恋，我希望在这伟大的时代中，我能够更有力气追随着毛泽东的光辉的旗帜而前进，不再像过去追随得那么痛苦。”（1949年7月18日《在铁链中》集“后记”。）